



体育智慧说的哲学解释——兼与茅鹏先生商榷

高强

摘要: 本文首先概述了茅鹏所提出的体育智慧学说,分析了其对体育运动中“技艺”的智慧禀赋,探讨了“技艺”与“明智”的关联,趋向于“科学化”的过程,以及对“简单论”、“二元论”的批判;再者本文引入了亚里士多德的“技艺”学说,在“技艺”概念在体育运动中的适用性和“技艺”、“明智”的辩证关系维度上考量体育智慧说的哲学内涵,发扬体育智慧说对传统认识论的反思和知行观的把握。最后本文引入了“技艺的实践习惯”和“科学的技艺内涵”两个概念,尝试在当代认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体育智慧说形成补益。

关键词: 体育智慧说;技艺;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1207(2016)01-0052-05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Sport Wisdom Theory: A Discussion with Mr Mao Peng

GAO Qia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of Healt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Beginning with the overview of Mr. Mao Peng's theory of sport wisdom, the paper analyzes the "techne" in sport, the relation between "techne" and "phronesis",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ation, as well as the criticism on simplification theory and dualism. Furthermore, by introducing Aristotle's theory of "techne", it explores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techne" to sports an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e" and "phronesis". It tries to reflect the traditional epistemology on the basis of sport wisdom and grasp the view of knowing and doing. Finally,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two concepts of "practical habit of techne" and "scientific techne connotation" so as to profit the theory of sport wisdom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epistemology.

Key Words: theory of sport wisdom; techne; epistemology

1 引言:体育智慧说概要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茅鹏在多篇论文中介绍和分析了体育运动中蕴含的“智慧”。这一智慧学说,上承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人类智慧的区分下启了对当代中国体育训练和管理理论中存在的“简单论”、“二元论”思想的批判和反思,既有哲学的深度,又有经世致用的价值。若能在当代哲学认识论发展的视野,深挖这一智慧学说的哲学意味,希能拓展体育哲学研究的领域,将这种“实践可‘致’,而不可言‘求’”^[1]的智慧与当代哲学研究形成对话与相长。

茅鹏所描述的体育“智慧”“现实地存在于运动员、教练员、体育运动领导干部以及其他人们的头脑中”^[2],可见这一“智慧”形式可以在运动员的训练、比赛行为和教练员、领导干部的指导行为中得以体现。茅鹏区别了在不同场域所体现的“智慧”内涵所在,前者为运动能力智慧,而后者为训练智慧。在运动员的训练、比赛行为为主要表现

形式的运动能力智慧中,“技艺是运动能力智慧的直接体现和基础层次”,而以教练员指导为主要方面的训练智慧中的“智力体现一般属于‘实践理性’的范畴”^[3]。

以“技艺”为核心的运动智慧能力使“肢体获得‘智慧禀赋’,具备‘智慧附加值’,从而‘智慧化’”,茅鹏用了“软件”和“硬件”这两个概念形象地指出了技艺与人的肉体之间的关联,而他认为每个人的“硬件”都大体相似,而之所以会产生运动成绩和表现上的差异主要来自于“软件的不同”。而这种软件的形成有赖于从“大量失败”、“偶尔成功”、“临场试用”到赛场“潇洒”的过程,有赖于“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名师的指导”和“确当的外部条件”^[2]。而以“实践理性”为核心的训练智慧主要体现在教练员对运动员“技艺”的培养,是一种“明智”的体现。但是这种“明智”的实践理性是“一种不可(或不便)言传的智慧”,只有在“耳濡目染”中才能实现在人际间传递,在“竞争和协作”中才能得以发展^[1]。

收稿日期: 2015-11-20

基金项目: 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TY001);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0ZD&052);

上海高校“立德树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体育教育教学研究基地项目(11000-515100-140)。

作者简介: 高强,男,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体育哲学。E-mail: gaoqiang.ecnu@gmail.com。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 200241。



“技艺”和“明智”之间是关联的,茅鹏挖掘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他借用了普特南^[1]的观点:“技艺‘有一种个人的、不能程式化的维度’,是否能掌握‘技艺’,达到什么水平的‘技艺’,不但要靠努力,而且还要靠智慧,这种智慧,不是‘理论的智慧’而是‘实践的智慧’,这就是‘明智’”。可见,在茅鹏看来,“明智”是“技艺”得以提高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即便是“明智”,也由于它是处于“信息主体处”,也会形成向外传输的停滞,所以需要将在“技艺”信息转变为“明智”形式,并将这种形式转变为“科学”形式,这就是茅鹏所提出的“科学化”过程,是“实践的人们意识中的信息运动方式的转化、进步、改造过程,是质的飞跃过程”,转化到体育运动层面,“科学化”体现在训练方法上从盲目性转变为科学化,进一步挖掘人的潜能^[1]。

在哲学层面上,茅鹏对“技艺”、“明智”、“科学”这一个变迁、跃升的过程的描述很大程度上也是“技艺”、“实践理性”和“纯粹理论(也可称为理论理性)”的变迁过程,但正是在对这一变迁过程的描述中,茅鹏形成了经世致用的理解。对当前中国体育中所渗透的“简单论”和“二元论”的反思是茅鹏的智慧说所着力之处,也是由“明智”形成“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某些偏差所在。首先“简单论”是在训练工作中将运动能力认作为一系列的简单因素——力量素质、速度素质等构成,认为运动进步的基本原理是“超量恢复”各种简单因素的一个过程^[2],这是抽象思维层次中所存在的辩证性所致:“对正确和前瞻性的逼近性(可错性)、自封性(错位性)、自大性(局限性)、封闭性(开放性)等等”^[2]。而训练中的“二元论”思想正是这种“简单论”思想的进一步衍生。因为从“简单论”出发,各种素质被简单区分,尤其将这些素质从丰富的技艺层面中区分出来,最为明显的就是在各个项目中区分了“体能”和“技艺”二元(或是“身体素质”和“技艺”二元),而导致了在某些项目上资源浪费和“被迫尾随”的状况^[2]。

2 体育智慧说的哲学解释尝试

茅鹏对“技艺”的智慧禀赋的洞见和运动能力、训练智慧的提出是其一元训练理论的重要部分^[4],也形成了对一直制约中国体育训练水平发展的“简单论”、“二元论”思想的深刻反思,不可谓不是一个值得深思和挖掘思想源泉。究于体育哲学的研究导向,对茅鹏的智慧说进行哲学解释的尝试是极具价值的,甚或能形成一定的“商榷”未尝不是体育哲学的一个发展契机。

2.1 亚里士多德的“技艺”、“明智”概念与体育运动

2.1.1 “技艺”概念在体育运动中的适用性考量

实然在当代社会中“技艺”概念一直是备受争议的,不少人认为技艺是属于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世界的前分工时代的人类活动”,而随着工业时代开始,“技”、“艺”逐渐分家,技术成为了“成批生产产品的操劳的机器操作活动”,“被理解为劳动、生产、工作”,而艺术则还“保留个体的手工制作的性质”^[5]。所以在工业社会中,技术和艺术是不同的两项理智品质,前者是“从业者自身无法控制的异己的、受约束的活动”,而后者则是“自由的活动”^[5],这样有人会

排斥“技艺”在当代社会的存在也不足为奇。但是在体育运动中,尤其在竞技比赛中,工业社会的“技”、“艺”分离失效。对技术的熟练掌握,个体能力的张扬乃至形成技艺仍然是体育运动的最为主要的方面,运动技术到运动技艺的提升过程的哲学认识论分析的依然是体育哲学讨论的一个维度^[6]。可见,时至后工业时代,体育运动依旧与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多提出的“技艺”有着血脉联系。可见在茅鹏的体育智慧说之中对“技艺”的强调正是认清和延续了体育运动中身体技艺的古今一脉相承性,而“简单论”和体能、技艺“二元论”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弥漫于其他社会领域的“技”、“艺”分离在体育运动中的一种误用。

2.1.2 “技艺”的哲学界定与它在体育运动中的关键地位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技艺”和“智慧”、“努斯”、“科学”、“明智(实践理智品质)”一起被认为是人的灵魂“把握存在世界的真的品质”。而技艺最为关键的特征在于“生成”的作用,就是将“作为质料或题材的东西”变成“存在物”的过程。这一特征就决定了“技艺”只能作用于“可变化的事物”,如石材、疾病等,通过建筑家、医生的建筑活动、治疗活动而发生改变,那么建筑家和医生的“技艺”品质就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但日月星辰等这些人力不可达到的事物,技艺品质就无法在其中发挥作用了。同时亚里士多德也指出了“技艺”常有的纰漏之处,因为“技艺”的知识只在可变化事物的可操作性的过程这个有效范围内才有效,所以它的作用是有其有效性局限的。但是也正是因为“技艺”与人的生活是最息息相关的,所以它有倾向于“越界”,形成“妄断”^[5]。

对“技艺”进行哲学层次的解读有助于深入理解茅鹏所提出的体育智慧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身心是一体的,甚或说身体有着更为基础性的意义^[7]。而茅鹏所指出的就是运动能力是一种技艺的体现,而运动技艺所作用的对象既不是石材,也不是航海,却是人的身体。而人的身体从其生物性来看,有着生老病死的变化,区别于日月星辰等这些不变的事物。在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5种人类灵魂品质,只有“技艺”是最为贴近人的身体,而只有运动能力的“技艺”才是旨于人对自我机体能力的超越,而不像医疗的技艺是让人恢复到平常状态;也只有“技艺”的生成性特征(“技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注重结果,对于结果的讨论是实践理性,即明智的对象),让体育运动更多的去强调过程而不是结果,这样很多对体育运动进行目的论的解读失去了哲学立论基础。同时,也是因为“技艺”的生成性的特点,决定了“技艺”的传递必然是一种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模仿、练习,试错的过程。但是究竟体育运动能为人们带来什么,抑或是教育目的,抑或是健康目的,只有在基于对“技艺”和其他理智品质的关系的理解中,才能形成意义。

2.1.3 “技艺”、“明智”之辩与体育“智慧”说的补益

“明智”与“技艺”一样,都是关注可变的事物。但是他们是有区别的:“技艺是一种与真实的制作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而“实践智慧的定义则包含同善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4种要素”^[8]。因为无论是“技艺”还是“明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都是



以求善和求真为目的的,所以有学者就认为,“技艺”与“明智”的区别仅仅来自于一个是实践行为,一个是制作行为,而产生这种区别的行为仅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希腊城邦时代,实践行为是由自由公民来进行的,而制作行为却是由奴隶完成的^[8]。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克伦理学》的中文译者廖申白先生也承认“亚里士多德没有去研究这些理智品质相互间的影响”,“把自己的研究停止于说明这些品质各自的性质”上。

只有在两者的性质上可以看到,每种“技艺可以被看做是伺候于人的某个具体目的的手段”,虽然会失真,但是依然“展现存在的世界”^[5],让“明智”有了发用的空间,如若没有“技艺”的“失真”、“妄断”、“越位”,那么“明智”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廖申白先生意识到了技艺“对明智所伺候的实践活动的影 响应该是最为强烈、最重要”,但是却一直被忽略形成了迷失。在这里,绝大多数的制作活动的外在性形成了这种忽略。因为一直以来,将技艺的产生认为是“人们常常由于肉体生活的过程而有各种匮乏或需要,由于有这些需要,人们就追求外在事物,这些事物也就对于人显得是一种善或者目的”,这样,其实“技艺”不是“被看做是伺候于人的某个具体目的的手段”^[5],而是“伺候于人的某个具体的外在的目的的手段”。然而“明智”是“一种体现为行动的知识”,是在“普遍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的连结”中得以体现的,靠“直觉”才能得以把握的^[9]。可见“明智”存在着很大的内在性和个体性。但对“技艺”的偏差的解读下,“技艺”与“明智”的关联便被打断。在工业化进程推进下,“技术”与“艺术”分离,那么这种偏差就逐渐加深,与“明智”的间隔就愈加。

但是茅鹏在体育运动领域,将运动能力智慧和训练智慧并举不可谓不是一种创举,也是对一直以来“技艺”和“明智”之间断裂的一种弥补。因为在茅鹏的论域是在体育运动训练和比赛领域,运动能力的“技艺”所追求的身体技能的提高和发展,毫无疑问是“具体的、内在的目的”,这点就符合了“明智”以个体的、内在的方式追求善的一种性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茅鹏的体育“智慧”说对当代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和古希腊哲学在当代的重光有着积极的补益。但茅鹏通过“智慧”说对“二元论”和“简单论”的批判更是直面了传统知识论中“完全的明确知识的理想的虚妄”所在^[10]。

2.2 对“二元论”、“简单论”的批判与对传统知识论的反思

茅鹏认识到以“抽象思维”为特征的理论智慧虽然会促进“技艺”和“明智”的发展,但是有时候也会形成曲解的作用,形成对各种因素“简单化”的解读、“二元化”的分裂。从当代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对“抽象思维”的反思正契合了当代认识论研究对客观主义认识论的批判。如若从这一哲学批判的视角对茅鹏的反思进行铺陈,一来能够呼应哲学界的批判进程,二来也能重现体育运动作为集“技艺”、“明智”、“智慧”于一体的身体活动的哲学价值所在。

2.2.1 反思“抽象思维”的高扬的哲学认识论基础

茅鹏所反思的理论智慧在中国体育界的“优势地位”。然而在亚里士多德处的“理论智慧”虽然是处于智慧的高级水平,但是依然不排斥、不贬低“实践智慧”和“技艺”,为何又在现当代成为了独尊的知识样式,其间有着深刻的哲学认识论根源。

这一现象首先需要从“技艺”的身体性谈起,虽然古今体育运动无论从形成的社会背景还是具有的符号意义来看,已经有了极大的差异性,但是作为一种身体的“技艺”形式这一特征仍然是主流。但是身体的“技艺”是否形成知识,则在哲学认识论的变迁中几经颠沛。

首先古希腊时代,身体的“技艺”是一种知识形成的方式。法国人类学家勒布雷东在其作品《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中阐明了在欧洲处于“以整体论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时代(区别于近现代工业革命后的社会),无论是在民间传统信仰还是在《圣经》中,“身体不是分裂的对象,人被融入宇宙、大自然与群体当中”,所以人的身体和认知行为是不分离^[12],认知行为中蕴含的智慧也是与身体相关联^[12]。所以也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的对人类5种理智(智慧、努斯、科学、明智、技艺)的整合是在古希腊对身心一体观念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的^[11]。

但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身体一体观念,在近代形成的哲学认识论中被打破。一种“新的认知形式”,包含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等等因素,已然形成。其中笛卡尔的二元论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笛卡尔提倡‘我思’之人,而身体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沦为被轻视、贬斥的附属品’。这样在本体论意义上,人被分为了‘身体与精神’这两个部分。所以‘在笛卡尔眼中的人是有两方面黏合而成,一边是精神,其存在的唯一意义即思考;另一边则是身体,或机体(人体机器),可简化为唯其自身的广延’”^[12]。所以在这个阶段“沉思科学逐渐向积极科学过渡”,认知行为变得“有用、理性、不带任何情感”^[12],而这种科学和认识行为,人的身体以及以身体性为特征的“技艺”则不包含在其中,但是指向于那些不变化的事物——日月星辰——的理智形式——智慧、努斯和科学则得到了彰显,那么也无怪乎蕴含其中的“抽象思维”得到了高扬。在现当代,波普尔以“三个世界”理论为代表的客观主义认识论将这一观念推向顶峰。他区分了3个世界,“世界1是指物理对象和物理状态的世界,世界2是意识状态或者心灵状态或导向行为倾向的世界,世界3是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其中包括理论体系、问题和问题情景、批判性论证、讨论的状态”^[13]等等。在此基础上波普也区分了关于世界2的知识,即主观知识和世界3的知识,即没有主体的客观知识^[14]。沿袭了波普的分析之路,但是却抛弃了波普对主观知识的提及,便认为“体育就是体育,他是行为,不可能是知识”,也“不产生知识”^[15]。

所以在这种从身心二分,到主观客观知识二分,最后所形成体育的非知识性的哲学认识论定位下,“技艺”中所丰富蕴含的智慧和知识当然地被缺失。而客观知识正由于它出色的社会效率性逐渐主宰了身体,同样也就主宰了身体的“技艺”,那么以“抽象思维”为主导的“二元论”和“简



单论”就理所当然地占领了体育这里领域。

时至当代哲学的发展,对二元论(这里的二元论是指心物、主客、主观客观知识、行为者和行为等哲学研究中的二元论,而不是茅鹏在文章中批判的“体能”和“技艺”相区别的“二元论”)的批判反思已然成为了显学之一,无论是在哲学界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还是社会学界布迪厄的实践理论都是目标直指二元论在不同学科的影响。茅鹏的体育“智慧”说对“抽象思维”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就契合了这一哲学界、思想界的批判思潮,既可以认为是一种思想层面上的厘清,同时也是为训练理论的思想内核变革提供哲学基础。

2.2.2 体育“智慧”说的“知行合一”观

不同的认识论基础会衍生出不同的知行观,而不同的知行观则会影响着训练实践和训练管理工作的展开。“知行合一”一直是哲学界分析的一个概念。在“二元论”和“简单论”的视角下,虽然也同样承认“知行合一”的重要性,但是这种“知行合一”却是在以一种“理论指导实践”的面目出现,具体在“中国的训练工作”中就是“中国体坛体育行政的主要职责是领导”而不是“服务”^[1]。茅鹏的体育“智慧”说反思了这种在行政指导意义上的“知行合一”,而更多地强调了在哲学认识论层面上的“知行合一”。

从“技艺”到“明智”,再至“科学”是茅鹏体育“智慧”说的“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内涵——“技艺”存在着矛盾运动,在“明智”层面上形成了“非逻辑的、直觉灵感式的形式存在着”的主观逻辑。但是“直觉灵感信息的系统积累,再加有关的多门科学逻辑的促进,相应信息的逻辑运动状态会在意识中以质的跃进方式产生出来”,即一种“科学化过程”。由于体育运动的“以人体自身为主体”的特性,“明智”的水平仍然是决定性的^[2]。从这一视角看,茅鹏的体育“智慧”说的知行观是在哲学认识论的层面上的一致,而不是简单的以“知”指导“行”的单向度思维方式。

可以看到,在这种“技艺”——“明智”——“科学”的跃迁过程中,“知”、“行”并不分离,教练员所具备的“明智”是“知行合一”得以真正实现的最关键一环节。但是在“简单论”下的“知行合一”观念是有所偏向的,“知”在其中占有了核心、领导性的地位,而“行”则成为了被分析和被操控的对象。这也难怪在“二元论”中为何区别“体能”与“技艺”以及线性思维的处理方式。

3 商榷:“技艺的实践习惯”和“科学的技艺内涵”

茅鹏的体育“智慧”说向我们深入展示了运动技艺中的哲学品格,也描绘了一张体育哲学与哲学学科共同进展的哲学图景,对其进行深入挖掘,也能延展这种哲学的批判反思品格。承袭这一品格,对亚里士多德的“技艺”理论进行深度解读和引入当代认识论研究对科学和技艺关系的讨论能进一步丰富体育的智慧内涵。

3.1 “技艺的实践习惯”

茅鹏在体育“智慧”说中刻画了从“技艺”到“明智”的上升之途,“明智”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技艺”的水平,指

引“技艺”发展的方向。但是通过解读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看,他严格区分了“明智”与“技艺”,因为“明智”的对象是实践,而“技艺”的对象是制作^[3],它们之间鲜有转换的机制。诚然,亚里士多德对实践和制作做出的区分是建立在当时的社会分工上,他所指出的实践更多的是伦理学和政治学上,是一种治理术,是自由民和政客所处的社会阶层,而制作却多指航海术、建筑术等等,属于奴隶这一社会阶层,这两个阶层的确鲜有转换。虽然这种社会分层在当代已经消失,但是廖申白先生的一种解读却值得深思。他认为技艺形成于“实践习惯”,但是却与“明智”无涉^[4]。当操作性、制作性活动成为了一种习以为常,甚至是约定俗成,那么将止步于“明智”之前。在这一层面上,“技艺”到“明智”的上升并非一条通途,相反熟练的“技艺”活动也容易滑向实践习惯,而不形成“明智”。茅鹏指出了“‘明智’实践可‘致’,而不可言‘求’”^[5],强调了“技艺”的实践在形成“明智”时的正向作用,但是“技艺”中存在的固步自封的特性也是值得关注的。在具体的训练实践中,“实践习惯”的制约作用是较为常见。这就容易理解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并不一定是一个优秀的教练,反之亦然。一个运动员自我的训练体验和经历往往是很难传达。在训练理论层面上,教练员的指导在一定程度上努力会避免“实践习惯”消极作用的发生,但是如何在哲学义理层面上对“技艺”——“实践习惯”这一路径进行刻画却也应是体育智慧说需要关注的。

3.2 “‘科学化’过程的技艺内涵”

茅鹏意识到了在“技艺”和“明智”中存在的“信息会停滞在信息主体处”,“向外的传输功能非常艰涩,传输过程中也会发现信息的丢失”等问题^[6],这与“技艺”容易形成“实践习惯”不无关联。茅鹏引入了“科学化”的概念,使“明智”中具有的大量“直觉灵感信息的系统积累”,加之“多门科学逻辑的促进”,就能产生质的飞跃。但由于体育运动“技艺”的人体自身的主体特性,“‘科学化’可以不断推动它进入更高级的境界,但是永远不会进入到无‘明智’参与的‘非技艺’境界”^[7]。

茅鹏的这一做法有其积极意义,为体育运动划出了自己的场域,让充满“抽象思维”的科学在体育运动这一场域中的作用受到“技艺”和“明智”的制约,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张扬,这与在其他受客观主义知识论影响颇深的自然科学领域相区别,也可以说,茅鹏为人的主体性留下了一个自由的空间。茅鹏的这一做法也是一种“区隔”的做法,但是当代认识论研究的对个体知识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给“科学”带了“技艺”的内涵,从而化解了这一“区隔”,其中波兰尼的个体知识论就较为清晰地陈述了科学发现过程中的“技艺内涵”。

可以说,“科学化”过程是一个发现知识、应该用知识的过程。波兰尼关注的并不是科学以书面形式体现的知识,而是更关注发现和应用的过程。他揭示了其中存在的两套“规则”,一套是“严格规则”,比如乘法表,在科学研究中就体现为“实验、测量、计算、制作图表等活动的工作手册”,而还存在着“技艺的规则”,给了个人判断大量的



空间,在科学研究中就表现为“具有原创性的工作,如科学发现以及对发现的证实或者证伪活动”^[17]。波兰尼更加强调了后者,认为这才是科学真正的品格,而在其中就蕴含了大量的科学家个体的判断力,不能化约为一套简单的、明确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或者说是一套书面知识体系。波兰尼将其认为做一种“技艺”(这里固然会有人提出质疑,因为个体的判断力往往会有武断性和随意性,这样如何保证科学知识的发展?对此波兰尼提出了“理智的激情”和“信托纲领”两个概念。因为本文主要讨论波兰尼对科学的“技艺”内涵,而不专门讨论波兰尼的科学哲学思想,故不作赘述)。

从波兰尼对科学中蕴含的技艺内涵出发,就可以认为“科学化”的过程在实质上也是一种技艺发用的过程,同样需要训练、模仿,同样需要如茅鹏所提出的“明智”发展过程所需要的“竞争和协作”^[1]。所以在此层面上,波兰尼对科学的技艺内涵的洞悉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体育场域和其他自然科学场域中“科学”的“区隔”。在体育运动中,无论是在竞技抑或是训练场域,“科学化”的过程受到了“技艺”和“明智”的制约,而同样在其他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科学化”过程的完善,科学知识的形成,“技艺”与“明智”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此,在波兰尼个体认识论的推进下,茅鹏的“技艺”——“明智”——“科学化”的这一过程其实可以推广到其他的自然科学领域,而不仅仅用以解释体育训练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问题。

4 结论

茅鹏的体育智慧说来自于对训练实践和学理探究的洞见与思考。对其的实践应用可以增益于训练、比赛水平的保持和提高,亦可反思制约中国体育训练水平提高的种种因素。但是在哲学层面上的展开学理分析、引证将呈现一片新的图景。

这一新图景的关键是,在智慧说的关照下,首先体育运动,无论是训练、比赛行为,还是教练的指导和行政管理行为,都是一个包含着“智慧”因素的统一体,而不仅仅是身体行为的总和和政令的简单施行,肉体与精神在这里实现了相互的包容;再者,提升了体育运动中的训练、比赛行为的认识论地位,它们不再是一个身体的机械性活动,而是一个与科学探知相等同的认知行为,区别在于它产生的是不可言说,只可践行的知识;最后,体育智慧说也是一个具有批判品格的学说,它不仅对原有的“二元论”、“简单论”进行的深刻的批判,同时也为进一步厘清致因的哲

学根源提供了契机。虽然体育智慧说是在体育领域中的哲思探索,却契合了当代哲学认识论反思的脉络,甚或说是在哲学范围反思近代以来的二元论思想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提供了新的思想利器。

参考文献:

- [1] 茅鹏.运动训练中的“技艺”、“明智”与“科学化”[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1993,17(1):74-78.
- [2] 茅鹏.训练进化与智慧生机[J].体育与科学,2002,23(4):11-17.
- [3] 茅鹏.运动能力与训练智慧[J].体育与科学,1999,17(1):23-25.
- [4] 茅鹏,严政,程志理.一元训练理论[J].体育与科学,2003,24(4):5-10.
- [5] 廖申白.亚里士多德的技艺概念:图景与问题[J].哲学动态,2006(1):34-39.
- [6] HOPSICKER PETER. Polanyi's "From-To" knowing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phenomenology of skilled motor behavior[J].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2009,36(1):76-78.
- [7] MECHIKOFF ROBERT A.A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from ancient civilizations to the modern world[M].New York: McGraw-Hill Company, 2002.
- [8] 马万东.实践智慧(phronesis)与“技艺”(techne)之喻——由亚里士多德引发的现代思考[J].现代哲学,2007(1):58-62.
- [9] 郁振华.对西方传统主流知识观的挑战——从默会知识论看 phronesis[J].学术月刊,2003(12):17-25.
- [10] 郁振华.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7(8):5-10.
- [11] MECHIKOFF ROBERT A et al. A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from ancient civilizations to the modern world [M].New York:McGraw-Hill,2002.
- [12] 大卫·勒布雷东 著,王圆译.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 [13] 郁振华.“没有认知主体的认识论”之批判:波普、哈克和波兰尼[J].哲学分析,2010,1(1):147-157.
- [14] HAACK S. Epistemology with a knowing subject[J].The review of metaphysic, 1979. 33(2):309-335.
- [15] 李力研.谁能与我同醉? ——试解波普尔“世界3”中的体育运动(上)[J].体育文化导刊,2004(7):14-17.
- [16]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17] 郁振华.克服客观主义——波兰尼的个体知识论[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2,24(1):9-15.

(责任编辑:杨圣韬)